

春秋时期人文思想评析

许鑫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开始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人文精神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对传统的神人、天人及人与自身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形成了兼具道德性和自然性的人文思想,进而实现了由对天神的迷信向以人为中心的新观念的转变。春秋末期的孔子与老子这两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前人思想,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文思想体系。

【关键词】春秋时期;人文思想;道德;孔子;老子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58-04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特征。一般认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1]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正是奠定在春秋时代各派思想家们秉持这种人文精神对于人本身进行了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这个时期形成的特定的人文精神,为先秦人文思想和中国“人”文化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和人的解放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经济规律的变化,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殷周之际,我国封建制生产方式兴起,井田制按等级分封土地。但是,随着生产方式发生改变,领主制经济开始出现全面瓦解,井田制度被破坏,以土地买卖为基础的私有土地制度兴起。占有土地的人就获得了土地的绝对所有权,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购买或强占的形式累积土地,农民不再对耕种的土地有依附关系,也消除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役地租也开始逐渐向实物地租过渡。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人们可以通过城内专门设置的市场交换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料。

到了春秋时期,农业、手工业经济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冶铁技术的大为进步,耕地开始普遍使用畜力并配以铁制的耜进行。就手工业而言,官工业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上对工匠限制严格,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商品经济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专业性的商人和商品自由买卖开始出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日益迅速,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之间的摩擦与纠纷的增多,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向人际交往中的诚信、道

德、义利等问题,这必然就会引起人们对于这些行为背后的实施者——人——自身的思想行为的深入思考,同时也就一定会引起春秋时期各家对于人文思想的高度关注。

二 科技、医学的进步和人对自身认识的增强

作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也成为春秋时代人文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交流。

春秋时期手工业生产进一步细化专门化,《考工记》中就记述了当时30多个生产部门“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攻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值之工二”。^[2]当时各国除了拥有大辆战车之外,贵族和平民乘坐的车辆种类也非常丰富,如格车、辇、箱车等。这一时期的天文学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政教合一性质的,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春秋时期,初步确立了天文学的独立体系。人们通过观星术来观测天象,建立起“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的星象坐标系统,发现了十九年七闰之法,进而确立了阴阳合历的制历规则,这对于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自然鬼神与人本身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技术知识的更新,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人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人们探究宇宙的起源、结构、演化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思想以及人本身的存在与发展。

医学科学在我国起源很早,周代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医疗制度,对于疾病讲求综合观察病人的气色、五官、内脏等。春秋时期,我国的传统医学更加深入的研究人自身的生理结构,注重将人的生理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统一:①将人命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医学上的人道主义正是儒家的“恻隐之

收稿日期:2011-10-23

作者简介:许鑫(1987-),女,北京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心”和道家的“无欲无求”的人文观念的具体体现。
②防重于治,未老养生的治未病思想。^[1]这种防病抗衰的思想同产生于西周时期并一直贯穿中国社会的“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周易·系辞下》也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思想。^③天人合一,形神一体,这是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去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这种形神合一的整体观正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和谐精神。

随着人们对自身的研究愈加透彻,人的思想逐渐从神权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代人尊天事鬼,事无巨细都向神问卜求得福佑。“这种行为对人来说,是脱离了自己意志的主动、理智引导的行动,这种行动是没有道德评价可言的,因而这实际是在幽暗的观念世界中的行动。”^[4]到了周代,在天神与人的关系中,能明显的看到人的作用和地位的上升。

延伸到思想文化方面,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是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思想,同样讲求“天人合一”,要用人的理性来观察认识自然,在这一理论上,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将人从神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开始承认要重视人的自然属性,更加重视人的本来性情。从人的自然本性来看,人是趋利避害的,然而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每当谈及“利”的时候,人的道德性就会遭到质疑甚至否定。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打破这种传统,将人的感官欲望即“耳目声色之欲”和正常的物质利益需求视为了人性的内容,人的这种追求富贵享乐的自然欲望是和人本身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这都是人的本性而非恶性。孔子在论述道德的作用时就曾经指出“富与贵为人之所欲也”,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道家所言的“自为之心”。^[5]春秋时期各派思想家们普遍认为统治者的政策应该满足人的这种需求,“惠民”“安民”“利民”。当然,他们也提出了满足欲望应该有一个限度,要“足欲”,从而避免它走向反面,避免出现“非恶富也,恐失富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心理。

三 政治变革中社会民众力量的兴起和民本思想的成长

从周代到春秋时期,人文精神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本思想的成长和人们对道德的关注。

周人自己的统治理念中并不盲目的祈求天神的保佑,而是认为“民为邦本,本固而邦宁”。周初已经将天命与民命并称,要通过民命去了解天命。及至平王东迁,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诸侯国的势力

却在不断壮大郑、齐、晋、楚等国相继称霸,各国之间弱肉强食,“春秋无义战”一语道尽了诸侯争霸、唯强是从的本质。^[6]而且,国人暴动不断,百姓的怨恨之情同时也宣泄于天,这反映出当时天神的神圣性已经受到了普遍亵渎,不再完全是受敬畏崇拜的对象了。同时,各诸侯国为了巩固统治,改变以前单纯将血缘宗法关系作为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标准,开始选才任贤。《左传》中,桓公六年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庄公三十一年周太史更提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强调要依人而行。社会秩序的缺失伴随着各阶级阶层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从对人的价值的思考转到对人自身的思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各国统治者而言,他们一定会任用贤能改革变法,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这个氛围中,有志之士就能够在思想上、行动上对于人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探索,同时,在政治上形成了允许提倡发表不同意见的社会风气,宽松政治及言论自由的环境也更有利于学术的争鸣,君臣之间讲求人格的相对独立,君言其可,臣献其否;君以为否,臣献其可,春秋时期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对人文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道德,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开始关注人的道德问题,《周易·乾·象》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意思就是说天的运行是一往无前、富有规律的。人就应该效法天,像天一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伴随着人民的地位不断上升,人的信心就逐渐由神转移到自己身上,在周初表现为“敬”“敬德”“明德”的观念中。“敬”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8]从“敬德”“明德”所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就是“德”。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到了周公时期则系统的发展为西周的德治思想,要“敬德保民”,^[9]这也就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亲亲”“尊尊”的价值观念已不再受到大家的重视,反而由于利益冲突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对立,道德问题更加受到普遍关注。春秋时期延续了崇德重教的传统:对最高统治者要进行个人品德修养和实行德政的教育;选拔人才的唯一原则也是以道德为评价标准。^[10]

作为与“德”相应的概念,新儒家徐复观还提到“春秋时代则成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11]“礼”萌芽于周初,显著于西周末期,在春秋时期发展成熟,它既是当时的政治的规范也是流行的道德观念。《国语·周语》内史兴说“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这是以礼为一切道德的一贯之道。礼是当时

一切道德的依归,监查人的行为,确定人的祸福的不再是神、天命,而是礼。这里的礼更多的是指一种合理的规范与制度,使礼与人们生活的内容更加密切相关,这正代表了礼的新观念的最早确立。

伴随着这一时期人文思想的发展,中国传统宗教也逐渐转变为人文化的宗教原有宗教性的天演变成成为道德法则性的天,已经没有严格的宗教意味了。此时宗教中的道德性常显示出宗教中的人文性,祭祀的仪式也逐渐转化为人文的礼仪,不再具有神秘的氛围。

四 孔子和老子对春秋时期人文思想的总结

春秋时期,伴随着理性的人文精神的不断扩张,思想家们在天、神与人的问题上,实现了由对天神的迷信向以人为中心的新观念的转变,并在春秋末期产生出了孔子与老子这两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文思想体系。

(一) 孔子的人文思想及特征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发现了实实在在的人,虽然在孔子本人的言论中很少提到“天道”“人性”之类的词语,更未明确的对性的善恶作出评价,但是先秦的人文精神乃至中国古代正统的人文思想的发展,都是由其奠定了基础。

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也就是说,人在其本性上是相差无几的,而在伦理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差别则是由于后天的时间、学习、自身的修养不同而造成的。那么何谓“性”呢?在孔子这里,“天命谓之性”,“天命”,简单的说就是指道德的超经验的性格,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新儒家徐复观认为,“性”者,从生,应指人生而即有的欲望、能力等自然本能。孔子对于鬼神与天命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对前者无证其有无,但却将其排斥于自己的学问教化范围之外,要“敬鬼神而远之”;而对于“天道”“天命”则给以相当敬畏的精神。孔子将天命与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天生德于予”,即是说人的德性是天赋的,这就是将人性与天命相连接,是在具体生命中所开辟出的内在的人格世界的无限性的显现。^[14]另外,孔子实际上是认为人是趋向于善的。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思想对于礼的定义基本无异,认为礼一方面是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应该是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认为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优良秩序。他对礼的最本质规定性就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定仁是内在于每个

人的生命之内的,善的极致就是仁。

仁与礼的观念在孔子这里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人社会行为方面的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仁是一种道德境界,礼则是通向这一世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礼的节制下,才能达到“天下归仁焉”。

(二) 老子的人文思想及特征

老子是道家的创立者,相对于孔子儒学的道德法则性的天与人的理论,老子道家的人文思想则充分体现了其自然性和朴素性,《老子》一文中也没有直接提到人性这一词语,老子是以“道”的概念来阐述自己的人文思想的。“道”的概念是道家理论的基础。所谓“道”,指的是创生宇宙万物的一种基本动力,^[15]老子不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发现人的根源,并且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来决定人生与自己根源相应的生活态度。道家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放在宇宙根源的之处并要求二者相一致,所以,道家的宇宙论,实际上就是道家的人文思想。

老子认为,万物皆生于“道”,而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老子·五十一章》),而道的本质一种自然无为的状态。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6]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道创生万物,分化而为德,万物由其德而通于道,所以道也必然是人的根源,就是在这种“天道自然无为”的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道家人性自然的理论。从老子道家的这一理论出发,人应该效法最高法则的道,顺其自然本来的状态反对人有目的地去作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人要保持自己的原始的自然本能,就要使自己无知无欲(老子只是反对将心知的作用加到个人的自然欲望之中,妄加贪欲,而不是否定人的自然生理本能),故而,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消除心知,寡欲而至无欲。

将自然之道运用于人生角度,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绝弃智巧”,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在老子看来,最能体现人的本性的、最好的道德规范是使人回到原始的自然朴素状态之中。“弱者道之用”,老子提出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道。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8]“柔弱”背后则有一种刚大自主的内在人格的存在,是“以柔弱胜刚强”。其自然

朴素的人性论思想由此表露无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同老子的道家思想在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本身所拥有的人文思想等方面具有相近的时代精神,是互补互济的。孔子将仁义作为其思想的根基,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价值尺度和道德规范,是古代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老子的思想就春秋时期政治的动荡而引起的道德、心理、行为等的失衡而言,对于重建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观念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老子对于人类自然生存和生命的关怀,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与孔子思想相同的人类之爱的精神。不同于孔子的正面之爱的是,老子是

由爱自身而推及至爱天下。^[19]孔子老子的人文思想在使人达到向善的目的时努力的方向不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向善。

综观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想,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对人的思考,当然这些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过于理想化而不同程度的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尽管如此,先秦思想家对人文思想的探索仍然为后世人文思想的研究以及人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思想积累中,人对于自身的认识愈加深刻,也越来越接近于人的真实。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11]詹飞.先秦儒家的人性论[D].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 [2][19]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34.
- [3]沈长云.中国历史(先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8][9][13][14][15][1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1,40,79,290,278.
- [5]张瑞雪.先秦儒家人学思想初探[D].曲阜师范大学,2003.
- [6]周山.中国学术思潮史·子学思潮[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1.
- [7]朱熹.周易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6.
- [10]十三经尚书·周书·祭仲之命[OL].http://guoxue.com/jinbu/13jing/shangshu/ss_043,2000.
- [12]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1969.
- [17][18]王弼.老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4:14,2.

Summary of Humanistic Thought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XU Xi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ime is the important transition perio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The thinkers, out of the primitive theology destiny view in the Yin week time, began to observe the realistic society with the rational humane spirit judgment and allocate new thinking about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of God-man, divine and human, formed both the moral and ideological nature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God by the superstition to a new concept change of human-centered.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fucius and Lao Tzu summarized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form their unique humanities ideology.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ultural Ideas; Morals; Confucius; Lao Tzu

(责任编辑:胡金频)